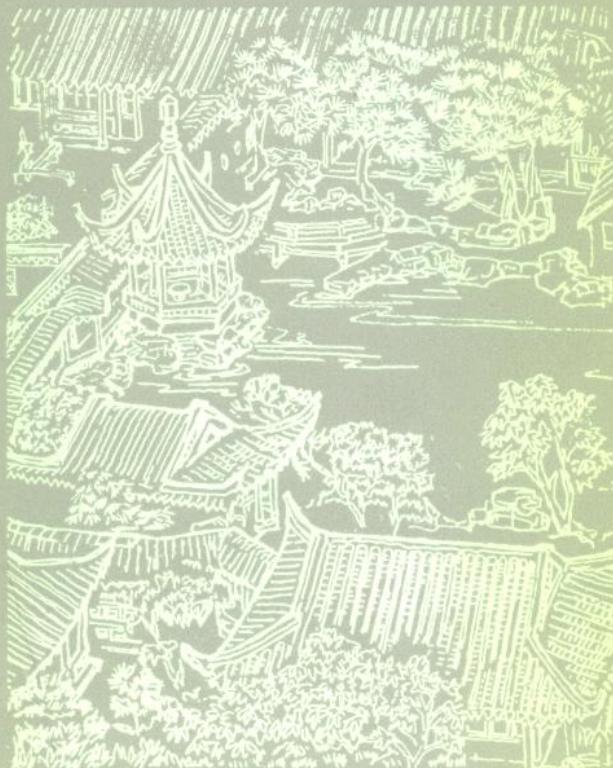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 编



华 书 局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

中 华 书 局

1984年·北京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Zhongguo Difangshizhi Luncong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7 1/4 印张·420 千字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册

统一书号：11018·1152 定价：1.95 元

前　　言

1981年夏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会议是建国以来这一学术领域的首次盛会。大会收到了百余篇论文，在会上进行了交流，收到了相互切磋的良好效果。当时，有的同志建议：为了推动地方史志的研究与编写，保存学术资料，以便专业人员参考，应该从大会论文中编选出一部专集；同时，又有同志提议再从解放以来已发表的史志文章中编选一部分入此专集。这些建议都得到多数同志的赞成和协会领导机构的同意，而中华书局也惠允接受出版，于是决定编选这本《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这本《论丛》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从送交1981年学术会议的论文中选编出来的，有史有志；下编是从解放以来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选编的。凡已被吉林所编《中国地方志论丛》选录者，就不再重复。所有被选录的论文都尽量商请作者作了订正。

这本《论丛》为了能选入较多作者的论文，所以除个别同志因两篇文章有连续性而同时选录外，其他无论作者有多少篇有关地方史志的论述，也仅选入一篇。即使如此，终因篇幅所限，有若干可供参考的论文都未能选入。这是深以为憾而希望得到同志们谅解的。

这本《论丛》是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论文编选组负责编选的。参加编选组工作的有左建、唐振常、丛佩远、阎崇年和来新夏等同志。编选组在编选过程中，虽然征求了多位会员的意见，但最后整理、编定仍由编选组承担，因此，这本《论丛》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应

由编选组负责。编选组诚挚地期待着协会会员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论文编选组

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 录

前言 (1)

上 编

整理旧方志与编纂新方志刍议 梁寒冰 (1)

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 谭其骧 (8)

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 史念海 (21)

中国地方志编目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和

释例 吴丰培 李 蕊 (39)

巨细毕收 博而能断

——论章学诚编修地方志的理论与实践 黄道立 (49)

乡土志浅谈 范学宗 (67)

方志刍议 王燕玉 (74)

从一个省志和县志谈到关于编写地方史

志的几点意见 史苏苑 (89)

关于编写方言志的几个问题 温端政 (98)

山西方志考略 刘纬毅 (108)

嘉靖《宁夏新志》的史料价值 陈明猷 (121)

银川城址的起源与变迁 汪一鸣 (139)

论西汉前期的形势及岭南的回归 何维鼎 (153)

江西古代州县建置沿革及其发展原因的

探讨	许怀林	(170)
松江府在明代的历史地位		
——明代上海地区研究之一		
王守稼 缪振鹏 王燮程	(189)	
《上海土地章程》研究	卢汉超	(210)
清末山东收回路矿利权运动	王守中	(247)
徐州煤矿发展史初探	余明侠	(266)

下 编

方志渊源考辨	黄 菁	(285)
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	傅振伦	(303)
历史上方志的派别类型和修志贡献	刘光禄	(308)
顾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	朱士嘉	(315)
论章学诚的方志学	仓修良	(324)
治天下以史为鉴 治郡国以志为鉴		
——地方志的继承与发展简论	邬烈勋	(351)
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	来新夏	(357)
编纂地方志刍议	李孝友	(373)
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	骆兆平	(392)
《析津志》与《析津志》辑佚	李致忠	(402)
《天津三卫志》试探	卞僧慧	(415)
明修九种云南省志概说	方国瑜	(422)
清修云南省志诸书概说	方国瑜	(439)
上海地区方志述略	谯枢铭	(455)
谈谈广东的地方志	黄炯旋	(476)

辽宁方志述略	邱富生	(481)
河南省地方志纂修的情况	杨静琦	(488)
从我国的地方志谈我省的地方志书	宋挺生	(494)
谈我省修志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魏桥	(516)
县志编修初探	李明 杨向东 陈有清	(523)
县志资料采访纲要试稿	马季文	(542)

上 编

整理旧方志与编纂新方志刍议

梁 寒 冰

一、关于整理旧方志

地方史志起源很早，周代就有“掌四方之志”的外史，《郑志》、《晋乘》、《楚梼杌》也可以说是地方史志。战国时的《禹贡》是最早的地理名著，包括疆域、政区、山脉、河流、道路、土壤、田地、物产、部落等等，《汉书》的志多由《史记》八书演变而来。如《食货志》由《平准书》演变而来，上篇记农业经济情况，下篇记商业货币情况；班固新创《刑法志》，记法制沿革，律令规定；《五行志》记五行灾异，自然灾害，地震，日月食；《地理志》记郡国区划，历史沿革，经济概况，户口，物产，民情风俗等。

唐杜佑《通典》记食货、职官、州郡、边防、礼、乐等九门。宋郑樵《通志》有二十略为全书精华，其中氏族、天文、地理、都邑、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等最为重要。在二十四史内，除七史无志的形式外，其余都有志的形式和内容，七史中梁陈齐周四史志料均入隋志，故有五代史志之称；志的篇目有二十种之多。宋以前的地方志，不出地理书范围；宋以后，扩大到人文历史方面，“人物志”、“艺文志”占有重要地位。明朝对方志很重视，不少名人参加编志工作，明代已有人专门典藏地方志者如范钦天一阁。清政府尤其重视修志，在各地方成立修志局，由学正负责检查。方志内容

丰富，体例也比较统一。著名学者如章学诚、戴震所修《永清县志》、《汾州府志》极负盛名。清朝还出现一批专辑古方志的学者，如王谟（《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

民国以后，方志学有所发展，如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黎锦熙的《方志今议》等，在修志理论上都有一定的贡献。

余绍宋所修《龙游县志》，黄炎培所修《川沙县志》著称于世。辑录古志，如鲁迅《会稽记》、赵万里《析津志》、张国淦《武昌记》（张氏从《永乐大典》辑古方志近百种）。但是，地方修志工作，大都陷于停顿状态。

一般说来，地方志是以社会为中心编纂的，许多不载于正史的社会史料，赖地方志得以保存下来。我国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情况，大多保存在地方志书内。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它不限于各阶级、各民族的各种社会活动，而且有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生产活动，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也不能不对人们的各种活动发生影响。旧方志保存下来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资料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应该把它继承下来，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旧方志的资料，必须经过选择，鉴别其真伪，考察其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可以无选择、无考证地照抄录用。

我建议将现存的八千多种地方志按地区编成目录提要；如能有选择地、分门别类地把它整理出来，不仅有利于历史研究，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整理旧方志的工作，将是十分浩繁的。如果没有各省（市）、专、县分工协作，只靠少数专家，是难以办到的。如果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一般都能着手整理本地旧志书，经过专区编辑加工，然后集中到省市区编辑审定，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听说，台湾把所藏旧方志，全部翻印出版。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把现存旧方志全部翻印，选择若干种最好的有价值的旧方志翻印出版，还是必要的。

整理旧方志，要依靠方志学、地学和历史学专家。每一个省市区应有一个整理旧志的专家小组，根据本省区的具体情况，拟出一个整理本地区旧方志的具体计划，提出今后五年到十年的规划蓝图，帮助一两个县整理出一两部旧县志的样版，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指导作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也应组织全国专家，制定一个整理全国旧方志的规划，或者建立一个小型研究会进行学术上的探讨。这次会议，由少数同志拟出一个整理旧志的初步意见，请同志们议一议。

二、关于编纂新志书

清朝以前，县有“县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省有“通志”，国有“一统志”。现在，编纂新志书，一是“县志”，二是“省志”，三是城市志。

新志书的编辑方针，应该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新方志主要应包括辛亥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历史和现状。举凡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地理、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等，都可以向上延伸至该地建置开始的时候；但是，只要扼要地加以追叙，不要占用较多的篇幅。古今关系，必须配置恰当，不能轻重倒置。追叙历史，不论是自然现象或社会活动，都要注意“古为今用”的原则。编纂新志书的出发点，应该是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不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建设。

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又是多民族国家，地区的差异性很大，必须注意地方的特点。不仅城市与乡村不同，平原与山区、沿海与内地、内地与边疆也不同，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其不同的特点，新志书应予以充分地反映。编纂地方志，不仅要注意它的特殊性，还要注意它的共同性，要适当地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既要反映地方的特点，又要有全局观点。不仅指导思想、编辑方针带有全局性，新志书的基本篇目和体例也应大体趋于一致，否则就会出现五花八门、各有千秋的混乱现象。因此，不论省志、县志、城市志都应有一个编辑方案或体例。筹备小组提出三个仅供讨论的省志、县志和城市志编辑方案或体例。我建议此次会议认真讨论一下编辑方案，推选少数同志分别起草出来，会后还可以研究修改。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搜集和整理资料，是编纂新志书的先决条件。首先，要广泛地搜集现存的文字材料（包括金石碑刻文物之类）。凡有关本地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文字记录要尽量地收集，使一切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和数据不致遗漏；然后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制作功夫，分门别类地进行科学的整理和编辑，才能作为编纂新志书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次，要作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不仅要向社会作调查，而且要向自然作调查。一切有关本地的自然情况和社会历史情况，都要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调查研究，尤其要注意调查访问本地区老一代的人。不但是老干部、老党员、老农民、老工人、老知识分子要访问，旧官吏、旧军官、旧商人、旧职员、旧书吏乃至神职人员也要访问，把他们所知道的材料都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调查访问工作更为重要，它带有抢救活材料的性质，是编撰新志书的重要依据。只有在搜集整理和调查访问的基础上，掌握了大量的真实可靠的资料，才能着手编纂新志书。

编纂新志书，无论县志、省志、城市志都应有一支专业队伍。如果每个县配备三、五人的专职修志人员，加上省志、城市志的专职修志干部，它将是一支很可观的修志队伍。专业修志人员应具备必要的条件：一、应具备高等学校毕业的文化程度；二、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三、要有一定的历史和地理的专业知

识；四、应有一般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五、要有一些方志学和编纂学的基本知识。如果说，一个人不可能具备全部条件，至少一个小集体是应该具备的。在着手编纂新志书之前，培训专业修志人员是刻不容缓的。或者由省市区编志委员会开办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或者委托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轮训，请专家们拟定一个训练计划和课程表。地方大学历史系可否考虑开设方志学和编纂学的选修课，为有志于从事方志学研究或参加修志工作的青年开辟一条新的出路。总之，专业、兼职和业余修志人员三结合，而以专业队伍为骨干，是完成修志工作的必要条件。

三、研究地方史，编纂地方志 的指导思想

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地方史和编纂地方志，也应遵循这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搜集整理大量的可资征信的资料，如实地反映本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统帅一切实际材料。因此，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有活用原则驾驭资料的能力，不要为浩如烟海的资料所淹没。新志书要具有思想性、科学性、现代性、知识性和稳定性，要经得起历史实践的检验。

为什么修志还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呢？新志书将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主要方面，不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从搜集资料，到分类编辑成书，要经过一个调查研究的长过程。调查访问的方法，审核资料的价值，辨别资料的真伪，进行科学的分类，直至编辑成书；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必然要把修志工作引入歧途，或者回到旧志书的老路上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

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检验过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

有的同志说，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就行了，不一定要提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犯过一些错误，有过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点和政策，因而有些同志怀疑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否妥当。有这种意见的同志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从一九二七年起经过三十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不仅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尽管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尤其是五七年以后一个时期的左倾错误，但不能因此而怀疑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我们的革命先辈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在总结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结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贡献，还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它代表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科学思想体系，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正确的思想体系，它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个别论点。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生活中都不可能没有失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观点也不能说他们的每一个结论，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思想是有正确的科学含义的，正如马克思主义一样是有确定含义的科学名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应用和发展。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对于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为什么研究地方史和编纂地方志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呢？自从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才破天荒第一次把历史学放在真正的科学基础上，才使历史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历史观”，是“唯一科学地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语）。我们研究地方史和编写地方志，如同研究通史、专史一样，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才能使地方史的研究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成为真正的科学工作。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科学体系，不论研究地方史或编纂地方志，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中央最近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有关哲学论著，无论从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言，对于研究地方史和编纂地方志都有指导作用。因此，我建议参加领导、研究和编纂地方志工作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原载《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5、6期）

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

谭 其 儗

我于 1932 年至 1934 年在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工作时,曾为该馆所收藏的地方志编了一部馆藏方志目录,以后就再也没有对地方史或地方志做过什么整理或研究工作。但我是一个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在几十年来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却随时要接触和使用地方史、地方志,因此逐渐对地方史志的源流、相互关系和使用价值等问题有了一些粗浅的看法。现在,各地已经开始或正在筹备纂修地方史、志,对地方史志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少专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今天我也谈两点粗浅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地方史、志不可偏废,应该并重

这次会议的名称是“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既是史,又是志,初看觉得有点不大习惯,但仔细一想,我完全赞赏这个名称,因为我们当前既应该有地方史,又应该有地方志,二者是不可偏废的。讲到这里,我首先要对清朝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实斋)开一炮。章学诚有名的理论是所谓“志”即是“史”,方志就是一方之史,我认为这种看法是迂阔之谈,并不可取。

事实上,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

这两种著作大体上都起源于汉朝，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是东汉的作品。

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都列于杂史，东晋的《华阳国志》，《隋志》列于霸史，《两唐志》列于伪史，现在有不少人把这几种流传到今天的汉晋著作看成是最早的地方志，实在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几本书的内容显然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所以隋、唐《经籍志》和《艺文志》里不列于地理类下而列入杂史、霸史、伪史类。不过地方志的渊源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了《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图就是地图，经就是说明，这就是方志的滥觞。

东汉以后，从隋唐到北宋，“图经”大盛，到南宋以后，才改称为“志”。当时由朝廷责成地方官编写地方志，每州或郡都要编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据朱士嘉先生统计，有八千多部。

东汉以后的地方史有各种名称，见于隋唐《经籍志》、《艺文志》的，有《会稽典录》、《建康实录》（今存）、《敦煌实录》等，还有某地的“耆旧传”、“先贤传”、“人物志”、“风俗传”等。这些书都列于史部旧事类、杂传类，不入地理类。唐宋以后，地方史远比地方志（即图经、方志）少，但一直沿袭到清朝并未断绝。如江苏扬州有汪中的《广陵通典》、姚文田的《广陵事略》；苏州有吴昌绶的《吴郡通典》；南京有陈作霖的《金陵通传》。四川宋代有郭允蹈的《蜀鉴》，清代有张澍的《蜀典》、彭遵泗的《蜀故》。云南更多，唐代有樊绰的《蛮书》，明代有杨慎的《滇载记》，倪辂的《南诏野史》，清代有冯甦的《滇考》、师范的《滇系》和倪蜕的《滇云历年传》，民国有袁嘉谷的《滇经》等等。民国时各省都有此类著作，不过不大有名。

在地方志盛行以后，仍然不断有人写地方史，这一点可以证明